



许冬林，现居合肥。中国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第十三届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学员，安徽省文学院第五届签约作家。著有散文集《养一缸荷，养一缸菱》《忽有斯人可想》等九部和长篇小说《大江大海》等。获奖若干。

年三十，舅舅打来电话，跟我妈说：今年过年，我就不去你家了，你也别来我家了，我们都不走动！

舅舅临挂电话之际，叮嘱我妈：“你也要待在家，千万别到处乱跑！”我在旁边听着，觉得叫我妈待在家十天半月不外出，这事有难度。病毒又不像虎豹那样的庞然大物，既是看不到，摸不着，没有文化的我妈就觉不出来事情的严重。

年夜饭吃过，弟弟不忘交待父亲：今年正月店门就别开了，都在家好好待几天！父亲笑而不答。父亲除了爱听点黄梅戏，几乎就没有其

两颗算珠

许冬林

它爱好，开店门做生意已经成为他生活的第一需要。甚至这么多年来，他每年大年初一就开了店门。

弟弟一家和我父母住在一起，我的房子在旁边，几步路的距离。吃过年夜饭，我心里盘算着，接下来的日子让这两个老人足不出户实在是个难题。我妈这个人特爱玩，又狡猾；我父亲这个老头呢，离了店大约就没了存在感，性格又有点倔。要管好这两个老人，我是老大，重担自然我来挑。

大年初一，上午我妈照例是要忙饭，一到下午，时间荒出大片来，我妈就坐不住了。中午弟弟打电话给我道：“阿姐，你来不来我家？老妈想要出去打牌了……”接下来便听见电话里我妈和我弟的声音：一个说，“尽瞎说！我哪里说过要出去打牌了！”一个说，“哦，你没说过，那是我猜错了。”我听着，心想，一定是我弟在试探我妈守家的决心。还不错，我妈心思纯正。

但我妈到底戴了口罩溜出去一次，只是街上大大小小的棋牌室都被告诫关门。要想我妈不外出，必须增强我们内部堡垒的吸引力。晚上，我们陪我妈打掇蛋，弟弟和弟媳轮流上。我妈有了人陪玩，不亦乐乎，她在弟弟的指导下还冒尖做了几回头家。

陪我妈玩了几回掇蛋，她渐渐熟悉打法，并开始玩起花样。她坐我右边，不时偷看我牌。我发现我妈打牌风格不佳，开始盯紧我妈。果然我妈打牌做假，经常用红色方块冒充红桃凑同花顺，还经常扣斤少两，三带两缺牌。被盯上的我妈成了尾家钉子户，包输。

一回下午，我妈两点多打来电话，说道：“你下午有事的话就别来了，我已经上床了。”我那天想在家把手中一本书看完，便顺口回她说不能去了。电话打过，想想觉得自己有些心狠，她的电话其实不是叫我别去，而是有了催促之意。翻译一下，其实是：都两点多了，女儿你怎么还不来，我还没上床在等你呢。

唉，我妈的小心思呀！

父亲识字，会看微信，劝他宅家，基本是做好宣传就可以了。我把微信上看到的官方发布的疫情状况及防控之类内容不时转发给父亲，好比大喇叭时时刻刻在他耳边喊。可是，下午忽然听儿子说：“有同学看见家爹爹开店门了。”我大吃一惊，忙打电话过去问。

“老人家，你开店门了？”

“我没开。”

我心想，不得了，这老头也会撒谎了。

“你就是开店门了！有人说你开店门了！”

“谁说我开店门了！”父亲的声音在电话里大起来。

“有人路过店门口，看你店门开的。”

“是政府里人，要来拿警戒线一类东西。”

在抗击疫情的严峻时刻，除了医护人员忙，小镇上的政府工作人员也忙，他们摸排到一些跟武汉人接触的人员，打电话给父亲，来买警戒线之类物品，在农村居家隔离人员家门口拉起来。这几日，父亲关了店门，白天都待在店面楼上的房子里，随时听候电话联系，提供物品，配合政府人员的防疫工作。

翌日中午得知，紧邻我家楼下的一户人家，门口已贴了居家隔离的警示标语。虽只几步路，我和我妈也暂停来往。

晚上跟我妈视频，她已上床，我们互相叮嘱对方不外出。视频里，父亲也上了床，他靠在床头，正在手机上看黄梅戏《夫妻观灯》。我妈说：“我们一人一部手机，各玩各的。你放心吧！”看着这一对老夫妻这么早上床，齐齐靠在床头，坐在被窝里，像两颗憨厚听话的算珠，宅在方框里，听凭我们安排或拨动——我深深感受到人间可贵的温暖与平安。



毕瑾，本报副刊编辑

我的老家是在远离集镇的深山里，一个村庄，5户人家，分散坐落在山排上。那时候的年节，是神不知鬼不觉来到的。

那天，有位不知从何处而来的老头，大老远便吆喝“灶王爷来咯～接灶王爷咯～”，边走边从斜挎包里掏出一张红色画纸，递在母亲手上。母亲接过，老头嘴上又念着“灶王爷祝你家宅平安，多福多旺啊”，母亲一边笑着感谢灶王爷，一边递给老头几毛钱，外加些吃食。

小时候很喜欢这些画纸上的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像，觉得他们慈眉善目、让人亲近。母亲说，接了灶王爷，就要准备过年了，于是便开始数着日子，带我们剃头、洗澡、大扫除、赶集、置办节食。

最忙的是做节食的晚上，我们姐弟仨围在灶膛上，看着父亲母亲

大展身手。父亲的年糕总是做得很气派，足足有小澡盆那么大，切割取食，蘸着红糖，百吃不腻。重头戏在各种“煎、炸、炒”，糯米圆子、粳米圆子、萝卜圆子、肉酥圆子，生条、蛋饺、豆腐方，花生、瓜子、炒米……母亲也不嗔怪，任凭我们姐弟仨将圆子捏成各种奇形怪状。炸得金黄的圆子被母亲用漏勺舀起，盛放在蒲篮上，还没散热，我们便迫不及待抢一个放在手心里，匆匆翻滚几下便塞入口中，“滋滋溜溜”下肚。通常，这些节食还没做完，我们便打着饱嗝趴在灶膛上睡着了。

去邻县赶集最撩人心弦。我们总猜，邻县集市一定是个藏百宝的地方，因为父亲总能从那里带回各种货物，还有诸如搪瓷人、泥娃娃类的小礼物。只是路途遥远，来回得一天功夫，母亲总说等我们长大了再去，后来迁居下山，离邻县近许多，周围早已店铺林立，赶集不再时兴。

下山后的十几年，我们一直租房，房子换了不下二十处，周围的邻居也是换了又换，年节也马虎着过一年算一年。唯独祭祖一事，父亲一直很严肃，从准备三牲、三茶五酒，到一个个坟头上香、烧纸钱、行叩拜礼、祈愿，父亲带我们

风味年俗

毕瑾

认祖追远，从无缺漏。

虽说到了山下，自家年味少了些，但乡街上却颇热闹。那些年，日子好过些，乡街上人们都争着放烟花。有一年，春晚舞台上，十二点的钟声还未敲响，街上已是鞭炮声鸣。正在守岁的我们火速冲到楼顶上，被巍巍虎形山脉聚合下的夜空中，竞相燃放着五颜六色的烟花，泼洒出一卷别具风味的彩色画廊，此起彼伏，恍如童话。那是我见过的最热闹也是最美的除夕夜。

临近元宵节时，若是天气晴好，乡街上还会有舞狮会、走龙灯、跑五猖。

相比单纯斗舞的舞狮会而言，走龙灯则很气派——打头的是两条竹龙，后面跟着一两百号人，一人手提一灯笼，排成长龙，傍晚时分“出龙洞”，走街串巷，接灯的人早早地摆了吃食和财礼放在家门口，只待龙灯走过正堂，送去福气和财气。

母亲说，为了驱走瘟疫邪气，护佑一方平安，乡街会跑五猖，但小孩是不能看的，会沾染晦气。禁不住好奇，我曾拉开窗帘偷看，那些“五猖兵”身着红衣、白衣、黑衣，脸上画着青、红、白、黑、黄五色，手上拎着钢叉、宝剑、长枪抖动呼喝，足踏高脚，沿街游行。五猖兵经过时，呼喝声响彻山谷，

着实很吓人，我没敢看完，赶紧拉下窗帘。

那是旧时年岁里的记忆，长大后，很多年俗渐行渐远，似乎也不再以前的神秘和神圣。直到嫁入他乡，久违的年味又开始在心底升腾。

先生家在一条老街上，老街背靠山河，狭长的石板街道两侧集聚着上百户人家。尽管宽敞大气的新街已落成不少，老街上仍不改风色，作坊、茶馆、中医馆、杂货店、制衣厂、祠堂样样俱全，尤其小年过后，糖粑、年糕、麻球、酥圆、泡果、麻条等，各种小作坊里的时令年食总能随着穿堂风，飘香过户，唤醒一整条街。

老街的大年夜有讲究，年夜饭吃完即需开门拜年，俗称“跑年”。跑年时，家中正堂摆放桌盒，家里的青壮年，带着新媳妇，有小孩的带上孩子，挨家挨户，给长辈问安、送祝福。老街上的青壮年平日在外工作的多，这样的流水式拜年，无疑给代际之间相互了解、增进感情提供了绝好的时机。通常老街新街转一圈回来，需要一两个小时，第一次体验时，确实感觉有些累，但心底却异常兴奋，这样的烟火气、人情味让我对他乡亲近许多。

只是，一场突发的疫情，让老街的鼠年春节清冷许多，家家户户闭门不出，街面上也少有人往。老街的春天还没来。

